

理解与借鉴：《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争论中的全球资本主义》述评

李 滨

由亚历山大·阿涅瓦斯（Alexander Anievas）主编，收集西方国际关系、历史、哲学、发展研究等领域 15 位知名学者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的最新进展论文集——《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争论中的全球资本主义》（以下简称“《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于 2023 年 6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书出版之际，作为本书的主译和统稿校阅者，笔者感到有必要对此书的脉络及其特色加以说明，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此书，并学习借鉴本书方法，提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水平。

《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冷战结束后对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集大成。首先，本书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上的探索，通过辩论的方式把不同观点及其相互争鸣汇集在一起，既让人耳目一新，又让人鉴赏到不同观点的内在逻辑。书中的文章还通过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对话，提出了一些有创新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方法观点。虽然这些方法与观点颇受争议，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百家争鸣的景象，从中学习这些学者是如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与原理的。

要想欣赏本书中所收录的论文，首先要理解这些作者聚焦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是如何产生的，它们与现实有怎样的联系。

全书收录的论文共 13 篇，每篇独立成章，主要探讨两个看似独立实质上相互联系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在经济全球化下，特别是资本在全球不断融合的条件下，还存不存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如果存在，造成这一竞争的机理在哪里？

第二个主题——与第一个主题密切相关，即国家间互动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内在机理是什么？这一特征与机理是否具有跨历史性，或者说是否可以脱离具体时代的生产方式？在这一特征下，国家（或不同社会）间的互动对当代地缘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两个主题只有结合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和马克思主义语境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下面从这两个方面来谈一谈本书的两个主题。

一、第一个主题：当今世界是否存在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竞争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争夺销售与原料市场的状况提出，帝国主义之间的经济、政治最后是军事竞争不可避免。这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属性且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由民族垄断资本主导这一现状提出的观点。这一观点与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关于大国竞争的观点存在一致性。但现实主义是从世界的无政府状态这一假设出发的，

根据所谓的“安全困境”提出大国之间必然存在地缘政治竞争的观点。然而，冷战结束后，在苏联的剧变和苏东集团的瓦解以及随后的经济全球化下资本的国际融合条件下，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是否存在这一命题是否过时，在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一争论中也相应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列宁的观点已经不适用了；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列宁的观点依然适用，资本的国际融合只是暂时的、表面的，背后或长远仍隐藏着不可调和的利益与权力之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中的第一个主题。在这一主题下，一些作者围绕这两种观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一）围绕两种观点的争论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条件下，会不会出现新现实主义理论所预见的大国地缘政治的冲突，即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会不会受到来自其他大国的制衡。新现实主义的创始者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言之凿凿地预言一定会，但认为这必须有一个过程，不会立竿见影。因为这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结构使然的。^①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特别是列宁-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出发，如果从字面来理解的话，冷战结束，没有了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集团抗衡，资本主义大国也会为了市场与原料进行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进而是军事的竞争。

可冷战后的现实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整个西方阵营内部虽然有一定的经济摩擦，但彼此并没有发生越来越明显的地缘政治的竞争，特别是制衡美国的现象。与之相反，随着WTO的成立，在对南斯拉夫联盟、伊拉克、阿富汗等问题上，西方却保持着相对的一致性。这对新现实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来说，出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问题。对现实主义来说，这种制衡一定会出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出现一些暂时的偏离，但最终仍会回到制衡的轨道上。这就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修正。^②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没有出现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地缘政治竞争，这是否意味着列宁-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过时了，进而质疑列宁当年对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超帝国主义”的批判是否正确。“超帝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大国在争夺市场时，由于资本的垄断化进程不会停留在民族国家境内，还会跨国发展，导致资本的国际融合，进而形成一种世界性资本托拉斯，造成资本对世界的共同统治。而有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目前的西方大国协调只是暂时现象，最终仍会出现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竞争。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本书的第一个主题：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地缘政治，或者说“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今天是否依然存在”。

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今天是否依然存在”这一主题下，本书中的作者主要分为两个派别。一派强调，即使冷战结束，在经济全球化下出现资本跨国融合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大国的地缘政治依然存在。我简称这一派为“存在派”，它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瓦尔

^① Kenneth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3, Vol.18, No.2, pp. 44-79; also see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0, Vol.25, No.1, pp.5-41.

^② 有关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概述与总结，参见 Steven Lobell, et al.,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登·贝罗 (Walden Bello)、彼得·高恩 (Peter Gowan)、克里斯·哈尔曼 (Chris Harman)、约翰·里兹 (John Rees)、克劳德·塞尔法蒂 (Claude Serfati) 以及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 (Alex Callinicos) 为代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收录的卡利尼科斯的论文《资本主义需要国际体系吗?》(第1章)就体现了这一派的观点。另一派认为,资本主义现已开始在跨国层面从经济、政治上整合起来,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已成为过去式。我则称这一派为“过时派”,它以迈克·哈特 (Michael Hardt)、安东尼奥·内格里 (Antonio Negri)、威廉·罗宾逊 (William Robinson) 以及罗伯特·考克斯 (Robert Cox) 为代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收录的威廉·罗宾逊的文章《超越帝国主义理论:全球资本和跨国国家》(第4章)就体现了这一派的观点。可以说,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得以迅速发展的那些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界在这一个问题上,学者们不同程度地分属于这两派。虽然各派内部也有一些分歧,但整体上是这样的:要么认为,当今的世界是超帝国主义(帝国或资本的跨国国家)对世界的支配;要么认为,民族的帝国主义相互竞争依然存在于世界。

《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第一部分收录的文章就分属于这两派。首先,“存在派”的代表卡利尼科斯在其《资本主义需要国际体系吗?》一文中坚持“存在”的基础是,世界经济与国际体系受制于两种互不还原的逻辑。世界经济受制于资本的逻辑,资本需要世界性地理扩张,这是由资本主义方式中内生产目的决定的。而国际体系受制于领土逻辑,这种领土的逻辑来自欧洲的封建专制时代,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物,封建领主希望通过国家建设来增加财富。由此,欧洲专制君主之间为了领土与权力而形成了互动模式——竞争而制衡的国际体系。这种体系早于资本主义,但它延续到资本主义时代;这时国家需要资本主义为其提供增强国力的经济资源,因而支持本国资本的发展与全球扩展。而资本在全球扩张中也遭遇他国的这种基于领土逻辑的权力,也需要国家的支配与资助。两者相得益彰,共同支撑着国家的建设与资本的积累。即使资本的国际相互融合也仍然受到领土逻辑的制约,因为当资本融合给国家建设带来负面作用时,国家会限制这种发展。然而,各国在这种资本与国家的相互利用中存在着差异,造成了发展不平衡。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规律阻止了世界统一的进程。所以,卡利尼科斯认为,冷战后世界并没有出现资本的跨国融合,而是分为三大经济中心(北美、西欧与东亚),三者进行着政治与经济的竞争,而且在出现经济危机时,它们的政治经济矛盾会加剧。而冷战中美国支配的西方联盟只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能把它作为一种“优先的默认情境”。

“存在派”的支持者本诺·特施克 (Benno Teschke) 和汉内斯·拉赫尔 (Hannes Lacher) 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国家的多元存在(第2章)。他们认为,领土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出现的过程中受到社会时空差异和作为中介的地缘政治的影响,即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区域发展不仅高度分化(多元的差异性),而且在资本主义和现代主权兴起之前,就存在一种以领土界定的地缘政治的多元世界(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加洛林王朝的解体最终形成了一个多国家的王朝体系)。正是由于存在这两个因素,所以应当从历史的角度去说明,在某个历史时段,国家内部的社会力量组合是怎样的,以及由这种组合产生的战略何以应对无政府状态和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冲突;需要结合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和国内阶级斗争的背景来理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是否对抗。由此,他们含蓄地认为,由于生产的国际化导致资本利益的国际化,帝国主义国家

之间的对抗暂时得以避免，但这种暂时状态不可能永久化。

尼尔·戴维森（Neil Davidson）的《众多资本，众多国家》一文（第5章）也是一篇“存在派”论文。他认为，国家是阶级工具，但这种工具往往以一种中介作用体现出来，对内“充当统治阶级对其他阶级和阶层进行剥削和统治”的中介，对外在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阶级“打交道”的过程中代表“本国”资产阶级的集体利益。因为竞争性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只要有众多资本存在，就会有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只要有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它们就会发挥上述的中介作用，为资本积累服务。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是其制度的常态。

彼得·高恩的文章《工业发展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政治冲突》也是一篇“存在派”文章（第8章）。作者以近年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为例，认为西方大国在高科技和关键产业的竞争恰能说明帝国主义竞争依然存在，尽管这种竞争暂时受到相互依存的约束。

而作为“过时派”的典型，罗宾逊的文章《超越帝国主义理论：全球资本和跨国国家》则主张资本的单一逻辑。他认为，战后资本的跨国融合已经改变了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基于分立的民族资本的竞争状态，现在的世界经济与列宁时代的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

- 真正的跨国资本的兴起以及每个国家都被纳入新的全球生产和金融体系；
- 新的跨国资本家阶级（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TCC）的出现，这一阶级植根于新的全球市场和积累循环，而不是国内市场和循环；
- 跨国国家（transnational state, TNS）机构的兴起；
- 国际社会新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的出现，包括空间和权力不断变化的关系。^①

这样，从根本上说，就是资本的世界融合带来了世界政治统一化；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成为世界范围内协调与管理资本的跨国国家机构，而且民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被跨国资本家和精英所俘获，被改造并逐渐被吸收进一个更大的跨国机构结构之中。美国代表着跨国资本势力成为世界的执法者。这一切都由资本主义内在动力所致。因此，这一理论从根本上讲就是一元逻辑论，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与发展决定着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导致跨国资本的世界统治。

基斯·冯·德·佩吉尔（Kees van der Pijl）的《西方霸权与跨国资本：一个辩证的视角》（第3章）大体也可以归为帝国主义竞争的“过时论”。佩吉尔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认为，起源于说英语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在世界性扩张过程中，不断击败竞争者（模式），融合了世界各地的资本，逐步地形成了一个跨国的西方霸权，资本主义的地缘竞争模式在这种霸权下被协调替代。他以2007年伊斯坦布尔比尔德堡会议为例，说明了当今跨国统治阶级的协调。

马克·鲁珀特（Mark Rupert）的文章《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与帝国权力》（第6章）基本

^① [美] 亚历山大·阿涅瓦斯编：《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争论中的全球资本主义》，李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74页。

上也属于帝国主义竞争的“过时论”。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和国家间地缘政治竞争的规律可能会使得资本集聚在一起从而产生帝国主义——运用军事力量为资本积累服务；在当代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帝国主义与美国有关。自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影响力已经体现在世界秩序的结构、国家-社会复合体的组织形式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中，由此产生的全球权力既有强制性的方面，也有文化性的方面，两者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被交替或综合使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存在一种“由多元国际体系管理的经济统治模式”；美国这种帝国的动力来自其独特的福特式资本主义。

在第一个主题下，《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中比较异类的文章是第7篇文章《是还是非还原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问题吗？》。作者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批评了一些作者跟随新自由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是经济还原主义的观点，试图用一个非还原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基础决定论。他认为，这样都是不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经济还原主义；相反，西方的主流理论却是还原主义（还原到无政府状态）。霍布森的这篇文章其实旨在批评一些具有左翼色彩的学者不敢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元逻辑再来分析世界政治，这些学者怕被人说成经济还原主义。

包含在第一主题中的这些论文存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存在派”坚持列宁-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的结论（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依然存在），但又基本上拒绝了列宁-布哈林的方法（经济决定政治的一元逻辑），而用的是政治与经济分离的二元逻辑；“过时派”恰恰相反，在拒绝列宁-布哈林的结论的同时，坚持了列宁-布哈林的一元逻辑。而且两派之间都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相互批判。“存在派”批评“过时派”否定了帝国主义，用了经济还原论，以及得出了超帝国主义的世界和平论；而“过时派”批评“存在派”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元逻辑，并且使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的二元逻辑。面对这些批判，我们应当如何判断，这两种观点是否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

（二）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理解两种观点

客观地说，上述的两派都没有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中找到依据。

以“存在派”为例。“存在派”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的二元逻辑似乎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元逻辑。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就可以发现，这一观点其实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①恩格斯对这一似乎矛盾的句子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4页。

定性的作用。”^①这就是说，既定的上层建筑都是历史上生产实践的产物；在过去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上层建筑因素（甚至有些因素都难以考证历史上它产生的经济条件^②）作为一种历史遗留对现在经济运行发挥着作用；这就是既有的上层建筑对现存的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曾对这一现象做过解释：分工形成了执行社会职能的上层建筑部门；它们逐步地有了特殊利益和自主性，这种特殊与自主使它们发挥反作用。^③据此，恩格斯还提出了“合力论”，他说：“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④“合力论”从共时性（synchronic）的角度分析某个时段影响社会与历史的因素，这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作用都是相对的，没有任何一个具有绝对性。但从历时性（diachronic）角度来看，经济基础的作用最终是决定性的。因为既定的上层建筑因素都是历史的经济基础的产物，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经济基础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二元逻辑论并没有完全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建立在领土权力基础上的国际体系逻辑（包括国家的中介作用）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二元逻辑论”的作者把国际体系的建立溯源到封建专制时代。这来自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艾伦·伍德（Ellen Wood）对封建专制时代进行分析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认为，欧洲专制时代独特的生产方式造就了后来延续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体系（或者国家的中介作用）。这一国际体系在资本主义时代发挥着独特自主的规定性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结合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发挥的。^⑤从这一角度说，“二元逻辑论”还是一定程度符合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的。但它的问题是在用“二元逻辑论”分析具体的世界政治经济时，把生产性基础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放在什么地位；如果突出当时的地缘政治逻辑作用，那么很可能像一些批评者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中所说的，成了新韦伯主义的社会多元基础论，或者“与现实主义搞暧昧”，“……都还没能给现实主义一记重拳，现在居然转投现实主义理论，挖掘它的（部分）理论优点”。^⑥

“过时派”虽然拒绝了列宁的观点，但在原理与方法上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讲经济决定政治，但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从一般的抽象回到具体，回到具体的生产与生产关系之中。就是马克思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⑦的方法。因为马恩经典作家认为，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如果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4—605页。

② 恩格斯曾谈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4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7—614页。

④ 同上书，第614页。

⑤ Robert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in Trevor Aston and Charles Phil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0-63; Ellen Wood, “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981, Iss.127, pp.66-95.

⑥ [美] 亚历山大·阿涅瓦斯编：《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争议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第22—2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1页。

没有任何价值……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①。这样，在分析具体时代的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时必须结合当时的经济特征。其实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就是立足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征来分析当时的帝国主义的，正如列宁所说，不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②而列宁基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征，没有超越或落后于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来分析。他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时就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脱离了“……20世纪初的历史的具体时代……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③，即考茨基用没有出现的资本主义的现象来分析当时的世界政治。列宁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实论断过资本主义在当时不可能向“超帝国主义”方向发展。虽然在理论上，列宁承认资本主义确实存在“发展正在朝着一个包罗一切企业和一切国家的，唯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进行”^④的趋向；但他认为，资本主义在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会被其中的矛盾与冲突所阻断，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⑤这是基于当时形势的判断，没有被二战后的现实证明。所以，不能以列宁在特定条件下说的一些话作为教条。我们在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时，应当学习的是列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而不是基于当时条件下所做的个别论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过时论”虽然拒绝了列宁-布哈林在当时所做出的结论，但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并不是如有些批判者所说的，“过时派”成为当代的考茨基。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的扩张带来的政治统一也有过论述：“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⑥虽然马恩这里谈到的是资本在民族国家内扩张带来的政治的统一，但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这其中的逻辑同样适用国际，只是这种政治的统一比民族国家内的统一更复杂，不能简单化。从这个角度上说，罗宾逊的“跨国国家机构”论（包括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一书的主要观点）都可以认为是在资本全球扩张中分析世界性政治统一性的尝试。这种尝试立足于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资本的跨国融合这一不可否认的经济特征的基础上，与考茨基脱离现实的“超帝国主义”说是有区别的。

所以，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两种观点都没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是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方法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

二、第二个主题：“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的适用性问题

在国际关系学界，西方的主流理论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用一个底层性、跨时空的基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

②《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页。

③同上书，第401—407页。

④同上书，第144页。

⑤同上书，第14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础假设来构建其理论的。这个假设就是世界的无政府状态。而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社会的方法，以生产和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分析社会的路径的。然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毕竟不是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他们没有提出分析国际关系的具体方法。这样，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似乎缺少了一个像西方主流理论那样的基础性的、跨时空的基础理论假设。这也导致西方主流理论（包括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的第二个主题中，贾斯汀·罗森堡（Justin Rosenberg）提出用“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性假设（或一般抽象）。因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现象也是一个跨时空的现象，而且与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紧密相关。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强调的是“从一般到具体”，即一般的抽象（生产方式）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的表现（具体时空的生产方式）来研究社会。这样，把“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作为一般抽象是否要结合具体历史的生产现象，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第二个主题争论的焦点。

（一）关于“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作为一般抽象使用的争鸣

《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的第二个主题是，“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基本假设如何使用。由于这一主题涉及的问题很抽象，涉及的理论很深，许多内容对中国一些研究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的学者来说犹如天书，因此，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背景，再分析这一部分各篇文章作者的观点。这样，有利于读者理解这一部分的内容。

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无政府状态”是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即地缘政治竞争是由“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正是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产生了。这些主流理论既包括现实主义理论，也包括自由主义理论（自由主义只是希望设计某种制度促使各国合作，克服“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地缘政治竞争）。但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因为这一一般性的抽象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即生产及其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一切政治关系与形态的基础。但过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并没有提出类似“无政府状态”这样的一般性假设来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何用一种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一般性抽象来替代“无政府状态”，成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基础性东西，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大短板。《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第二部分文章的作者们提出了用“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这一基本假设替代“无政府状态”，即地缘政治竞争是由“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普遍现象造成的。

“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是俄国“十月革命”主要的领导者之一——托洛茨基针对俄国革命前的社会状况提出的。其基本意思就是，“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是一个二元社会，既有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是社会的多元性或综合性（combination）；而同时由于受外部资本主义的影响，俄国社会又是发展不平衡的，这是不同社会之间互动性所产生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第二部分文章的作者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现象具有跨历史性，并认为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都存在“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现象。正是由于有这种普适的现象，他们把“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现象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最基本的一般抽象。这样一定程度避免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把

“无政府状态”作为一般抽象回避社会性以及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的问题。因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已经暗含了不同社会及其社会生产关系的差异，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互动。这样，国际社会的多元性（或者说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多元国家也存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而且把地缘政治的竞争性也容纳进去了（容纳了“现实主义因素”，或者说为地缘政治提供了一个社会学基础）。

然而，怎样在国际关系中使用“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这一抽象？是否像西方主流理论应用“无政府状态”那样，非历史地使用“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这一抽象，还是结合具体的社会形态，历史地使用这一抽象。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第二部分文章争论的焦点。

罗森堡在与卡利尼科斯的通信集（第9章）的第一和第三封信中认为，既然“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是一个跨历史的现象，就不太必要再结合各个历史阶段的生产组织方式来分析其作用。他认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一般抽象不能对任何给定的生产方式提供特殊性的解释，这是因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给一个社会发展带来了额外的外来影响，这种普遍现象“原则上都与任何特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也无关，或者都不需要单独和连续地分析各种或所有的生产方式”。^①尽管他也承认，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比其他社会更为充分。

卡利尼科斯则在通信集的第二和第四封信中认为，虽然“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是一个跨历史的现象，但是作为一般的抽象必须结合具体的生产方式才能很好地解释它对地缘政治产生的作用；并且他强调，解释不同社会间的关系和趋势的重心应尽可能建立在具体说明一定的生产方式的结构和趋势的概念的基础上。所以，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可以而且应该扩展至融合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和地缘政治理论。并且，他引用布伦纳等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举例说明，在封建社会，封建生产方式对欧洲国家间多元性与互动性所产生的影响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产生的影响。

萨姆·阿什曼（Sam Ashman）的观点（第10章）与卡利尼科斯持有的观点大体相同，即强调应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置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特别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的重要性。但他比卡利尼科斯更进了一步，把不同社会间关系整合到一个资本世界体系社会之中，而不是仅仅把外部作用视为一个社会的额外附加物。这颇似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通过这种分析，他更强调“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作用的复杂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独特而复杂的作用。同时，阿什曼还指出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是竞争式积累，这一机制是“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基础。但托洛茨基未曾充分清晰地阐明这些，他也没有明确说明殖民和帝国扩张对被殖民世界的社会关系的确切形式以及这些形式的特殊性产生了什么影响。

同样，杰米·阿林森（Jamie Allinson）和阿涅瓦斯的观点（第11章）也与卡利尼科斯相近。他们批评罗森堡把“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作为一个一般抽象，使得其理论假设具有简单化倾向，这主要反映为其脱离具体的历史生产关系的倾向。因此，通过分别分析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简单”模式与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完整模式

^① [美] 亚历山大·阿涅瓦斯编：《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争议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第188页。

之间的质的差异，他们强调，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作为一般理论假设使用，需要结合不同历史阶段和各个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的特性。

亚当·戴维·莫顿（Adam David Morton）的文章（第12章）也批评了罗森堡把“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作为一般抽象时拒绝结合具体生产方式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没有从历史上和经验上探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实际形式”^①。莫顿通过用消极革命^②的概念分析19世纪末的意大利、20世纪美国式生产组织方式在世界传播，以及非洲和拉美在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影响下产生的独特国家形式，说明资本主义条件下多元社会互动及其发展不平衡在不同地域国家具有的独特性，以此强调“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产生的结果具有地域不同性、民族不同性的特点。这种特点源自一个社会受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影响的差异，其中，内部的阶级关系与传统也在发挥作用。

第二部分最后一篇文章似乎与全书的主题不搭界，因为它的逻辑与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联系。

最后说一句，第二部分的五篇论文几乎都反对罗森堡的如下观点，即“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作为一般抽象可以脱离（具体）生产方式来使用。这可能与《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的主编阿涅瓦斯的倾向性有关。

（二）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的适用性问题

“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虽然是托洛茨基首先提出的，但是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提出，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多元生产方式以及它们发展的不平衡性。“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③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其他生产方式或遗迹，没有完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于各种生产方式在一个社会中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④这似乎说明，一定社会中的不同生产方式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托洛茨基以“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为例，说明俄国社会存在“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是与上述马克思的论述一致的，只是托洛茨基在分析俄国社会时，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入外来影响的因素，这是马克思没有涉及的，这是一种发展。本书的作者们把“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现象拓展到国际，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因为应

① [美] 亚历山大·阿涅瓦斯编：《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争议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第256页。

② “消极革命”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针对19世纪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后资产阶级没有获得社会霸权而与传统阶级妥协的状况，提出的一种社会变革方式。这种政治变革方式主要受外来影响，革命后政权掌握在传统阶级手中，一种威权政府得以形成，但国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支持，而且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典型的资本主义体制。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5页。

④ 同上书，第707页。

用这一规律就暗含着一定的重视生产方式（或社会）不同性与互动性的意味。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应用这一规律。的确，“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现象是一个跨历史的现象，但如果以此作为一般抽象就不用去结合具体的生产方式来超历史地分析国际现象，似乎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存在偏离。但说它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成分也不客观，毕竟“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一规律就暗含着一定的重视生产方式（社会）不同性与互动性的意味。笔者在此认为，这是一种弱历史唯物主义，而强调把“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与具体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分析的观点是一种强历史唯物主义。

正如本文上一节提及过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①的方法。就像阿什曼所说，“科学”不在于发展出一种描述性的超历史的一般抽象，而在于提出一种规定性的抽象（抽象的和具体的），以及在于能分析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些规定性的抽象所要理解的关系和过程所产生的）趋势和反趋势的相互作用。如果超越历史的具体，任何一般抽象的概念都可能出现好像说出了一切，又好像什么都没说的的问题。现实主义使用“无政府状态”这一抽象假设方式就是这样（即使撇开这一抽象假设没有建立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一点不谈）。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的第二部分中，大部分作者都用案例批判了罗森堡超历史地使用“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观点与方法。就是罗森堡自己也承认，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为充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由于其生产的特性是最具扩张性的生产方式，它对世界的影响是以前的生产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至于罗森堡用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对比来说明超历史地使用“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的正确性，特别是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研究社会的顺序来证明其正确性，笔者认为这是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意思。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对比的错误性，卡利尼科斯已经批判了其比拟的不恰当性（第9章的第四封信）。在此，笔者想对罗森堡引用这一顺序证明其观点正确性所存在的问题补充一点。

马克思提出的研究社会的顺序为：“（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②这一顺序恰恰是马克思把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与具体的生产结合起来的体现。从阶级到国家，再从国家到国际，提出国际生产关系、世界市场和危机。这都是从一般到具体的体现，或者说从一般上升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体现。这其中没有把超越历史的一般的抽象作为分析的内核，而是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其政治的独特性。任何社会都有生产方式，如果不结合具体的社会生产来分析，就分析不了任何社会问题。

三、学习与借鉴

我们可以从这本书的文章中学习和借鉴到什么？这是阅读这本书后应当收获的最重要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世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特别是在中国，人文社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1页。

^②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8—709页。其中，第四点“生产的国际关系”的英文原文是“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笔者认为翻译为“国际生产关系”更准确，故在下文使用“国际生产关系”。

以马克思主义来引领更有特别的重要性。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是当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一书的最大用途就是向读者展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的，虽然我们不一定同意书中文章的一些观点。在我看来，此书的作者们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有如下三点。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的精通。从《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围绕的两个主题的各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虽持不同观点，但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方法。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的精通，就不可能对冷战后西方大国之间做出带有历史唯物主义色彩的分析。帝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冷战后的帝国主义特征是世界的重大问题。西方主流理论（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对这个问题做出过分析与判断。如果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就没有学术影响力。西方主流理论用“无政府状态”这一跨历史的现象作为其理论的最基本抽象假设，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自的理论。如果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通，就无法发现这一基本抽象缺乏的社会基础，就无法提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用于替代它的基本抽象的假设。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中国学者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上更有发言权，但是鉴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理解远远达不到用它来研究国际关系的程度，更谈不上理论创新。尽管近年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5·17”讲话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①；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仍达不到指导研究的水准。在这个方面，我们应当向《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一书的作者们学习，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理解其原理与方法。

第二，与西方主流理论对话的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对话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的第一个主题中，作者对冷战结束后是否存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进行辩论，实质上也是同西方主流的理论进行辩论。西方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冷战结束后一极霸权的现象是暂时的，之后必然产生均势的制衡；而自由主义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一个永久和平的时代。这与第一个主题辩论的问题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的第二个主题实质是用“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来替代西方主流理论的“无政府状态”这一基本假设。这是将从西方主流理论中吸取的一定的方法上的优点，应用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基本假设，并替代“无政府状态”。因为“无政府状态”这一假设脱离了社会或社会生产，而且被跨历史地使用了。而《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一书的作者更强调建立在社会生产基础上的假设并结合历史地使用它，力图建立一个从一般到具体的理论框架。如果没有对西方理论的精通并富有批判精神，这些作者是无法与西方主流理论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对话的，是无法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我国国际关系学界近四十年来大量引进了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些人只知道吸收，甚至把这些西方主流理论奉为圭臬，不知道批判地“拿来”。这就造成了只有崇拜，没有对话。比如，西方主流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指责它

^①《习近平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第1版。

是一种还原主义理论。如果读一读霍布森的《是还是非还原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问题吗？》就可以发现西方理论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从这一事例中也可以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理论都精通，是对话的前提条件。

第三，“没有口号、不拘教条、彼此争鸣”的严肃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是值得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研究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学习的第三个方面。首先，读完全书各篇文章，可以发现每篇文章基本上没有中国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论文的“口号化”与“标签化”的现象。而反观我们，个别学者为了赶时髦、追潮流，乱贴马克思主义标签。笔者曾参加过一个博士后出站报告答辩会，作者的报告题目是“马克思主义海洋战略研究”，所有参加答辩会的教师都认为，除了口号与标签外，报告中没有任何地方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同海洋战略的关系。其次，作者们不拘教条的精神也是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地方。在书中，关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一些论断是否过时，学者们都敢于质疑或者通过新方式重新论证（当然，正确与否有待商榷）。对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针对当时的论断，是否敢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进行质疑，体现着学者的科学态度；否则，很容易形成教条主义与思想僵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打破教条与僵化的产物。最后，学者们的争鸣精神。书中的作者围绕冷战后地缘政治是否存在、“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的适用性问题的争论和争鸣，使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方法在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体现和完善。比如，在书中的第二部分（关于“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作为一般抽象的适用性问题），正是因为卡利尼科斯、阿什曼、阿林森和阿涅瓦斯以及莫顿等人的批评，才使读者看到罗森堡提出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作为一般抽象的观点存在的不足，这也促使这一假设的应用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